



生活中

的

老一代革命家

史全伟 主编

(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与家庭

周 恩来、邓颖超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是著名的革命家。他们又是举世公认的模范夫妇。

革命与事业需要无私的奉献，而家庭相对群体来说是对立的，爱情排他或曰有私。周恩来、邓颖超则把革命与爱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们的爱情总是与革命交织在一起，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完全是自主和自由的，是在互相恋爱的基础上结合而成的。众所周知，周恩来、邓颖超都不是天津人。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青少年时代，周恩来自 1913 年到 1917 年在校读书，后赴日本留学，1919 年回到天津。邓颖超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学校的学生，周、邓彼此并不相识。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南开中学和直隶女师的学生。周恩来、邓颖超都是骨干分子。在运动中，为了便于统一爱国行动，天津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团体。于是，由 10 名男青年和 10 名女青年组成了进步团体觉悟社。他俩由此相逢相识，留有印象是淡淡的。为了免受反动政府的迫害，他们采用抽签的方式，取用一个数字作为自己对外活动的名字。邓颖超抽的是一号，按照谐音，她化名“逸豪”，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伍豪”这个名字由此而来。

其间周恩来、邓颖超之间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彼此非常自然，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想，追求进步。他们这时谈不上相爱，原因有二：

1.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上传播着各种思潮。受某种思潮影响，觉悟社社员规定了一条纪律，即在运动期间，不谈恋爱。周恩来公开声称要做独身主义者。邓颖超对恋爱结婚也抱着悲观厌世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2. 邓颖超当时只有15岁，是觉悟社20个社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周恩来比她大6岁，他和社员们一样，仅把邓颖超当作是自己的小妹妹。

1920年，周恩来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因路费无着，未能成行，到北京当小学教员。其他觉悟社成员也都各奔前程。周恩来到了欧洲，没有进学校读书，而是埋头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实地考察欧洲各国情况，探求救国救民的办法。他经常给邓颖超任编辑的《觉邮》写文章。为此，鸿雁传书，和邓颖超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谈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民大众的疾苦，中华民族的腾飞等问题。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彼此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一封不同往常的信，明确地提出从友情发展到相爱。此后的几封信，周恩来的意愿就越来越明显了，甚至在一封信中，要邓颖超马上表态，作出答复。邓颖超经过考虑，于是就定约了。

显然是周恩来采取了主动。周恩来为什么选择了邓颖超？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有一次在家中同侄女谈家常，谈到他的婚姻时，道出了真情：在旅欧期间，他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女朋友，那是个漂亮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选择了你的七妈（指邓颖超）”。

另根据我们所见史料记载，和周恩来比较接近的这位姑娘，也是觉悟社的成员，并已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只是她坚持要读书，不希望东奔西跑而荒废了学业，因此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后来，她果然在法国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者，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

旅欧期间，周恩来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也在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天津最早入团的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

周恩来逝世12年以后，邓颖超缅怀周恩来，以对周恩来说话的口吻，说道：“……遥想当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就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我们之间谁也没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相爱的基石和保证。”一对热血青年，其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二者的感情不只是相爱，而是升华到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的坚定信念。这是周恩来、邓颖超相爱的最可靠基础。

1925年，周恩来由欧洲回国，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党委

四、红色恋歌

等职务。邓颖超在天津参加了五卅运动的全过程，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天津党组织经与广东党组织协商，决定将她调离天津，前往广州，和周恩来一起工作。8月8日，他们结为夫妇。不需要证婚人、介绍人，没有仪式，更没有讲排场。一些旧风习，在他们的婚礼上被彻底清除。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爱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磨砺中，折射出恒久永远、灿烂夺目的光彩。

后人想要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公私两方面的表现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他们一直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服从革命的利益。在革命征途上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工作了五年。其间，国民党曾悬赏30万银圆捉拿中共著名领导人周恩来。为了确保他的安全，邓颖超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即当好家庭妇女，掩护好周恩来。他们随时都会身陷危险的漩涡之中，党中央机关时常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幸亏周恩来指挥果断，群策群力，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均转危为安。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协助、配合、支持周恩来的工作，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功绩不可磨灭。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受党中央的派遣，以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代表的身份，在南京、武昌、重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南京、上海工作。此时与30年代在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他们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合法的斗争。从党内的分工来讲，周恩来是邓颖超的领导者，在各界友人的眼中，他们是一对久享盛名的夫妇。他们二人密切配合，夫唱妇和，相得益彰。周恩来、邓颖超在与国民党历次谈判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人才上的优势，新闻媒体常常用“双星交辉”这4个字来形容当时周恩来夫妇的革命活动。广大人民群众从这一对共产党员夫妇身上，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全国解放以后，邓颖超担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务。而她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即：她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夫人，如何面对这种身份，经过深思熟虑，她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凡是代表国家进行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只能以周恩来的名义，不要加上邓颖超。周恩来尊重邓颖超的独立人格，表示完全赞同。因此，周恩来出访，邓颖超从不相陪。但周恩来宴请外宾，特别是设家宴，邓颖超作为女主人，则主动出席作陪。邓颖超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是我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现代史举足轻重的人物。邓颖超则是集革命家与贤妻良母两种品格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一贯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作为周恩来的妻子，深知周恩来的工作对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极端重要性。她甘居幕后，甘当配角，甘于默默奉献而不露形迹，其细致周到，可以和任何一位家庭主妇相比。这样就使周恩来无后顾之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工作上。善于观察、剖析人的曹禺认为，邓颖超性格中既有坚强的革命性，又有女性的温柔和贤淑，刚柔相济，十分难得。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共同上断头台，但是，他们确实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奋斗了一辈子。

二

志同道合是建立稳固的家庭关系的根基，而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与否，则在于爱情与爱心。周恩来、邓颖超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互相关心、爱护，营造出一种亲爱和谐、平等、协作的家庭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上孝敬老人，对下疼爱子侄。他们还出于光明磊落的爱，收养培育了许多烈士的后代。他们不仅尽到了本来意义上的家庭义务，而且超越了一般人对家庭的狭隘眼界，把家庭关系和家庭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周恩来说：“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周恩来、邓颖超是高尚心灵联盟的真夫妻，他们无私地把爱献给对方。不仅如此，他们越来越发现彼此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成为他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战争环境，工作需要，常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暂且分居两地，但他们不孤独，因为他们的心中都装着对方。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他们总结出夫妻生活的“八互”原则，即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是他们处理夫妻关系的准则，也是共同生活的真实写照，更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周恩来、邓颖超已经故去，他们没留下子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遗憾，但这不是生理缺欠使然。邓颖超曾两次怀胎，即1926年和1927年。那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婚后的邓颖超即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同时还要协助何香凝的工作，不久，又被指定为潮梅特委委员。面对这样重大的任务，邓颖超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感到十分不安，哪里有时间顾得上生孩子，养孩子。母亲远在天津，周恩来作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在汕头工作，异常紧张繁忙，身边没有可以商量的亲人。几经思忖，她认为自己才21岁，来日方长，不愁没有孩子。于是，她上街买药，自行打胎。随后便赶赴广东东江地区，出色地完成了国共两党交给她的任务。1927年4月，邓颖超再次临产，由于胎儿超重难产，那时医院还不能做剖腹产手

术，只能用产钳，致使男婴头颅受到损伤，生下来就死去了。后据一位日本医生检查，由于生产时的过度紧张，子宫没有收缩，有可能不能再怀孕了。后来的事实竟不幸被言中。

周恩来、邓颖超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但他们以父母特有的慈爱之心，关心、培育革命烈士的后代。

因此，社会上盛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收养了别人的许多孩子。甚至说前任总理李鹏童年也曾被收养，是他们的“干儿子”。其实该说法并不准确。事实是：李鹏的父亲李硕勋牺牲以后，他一直跟随母亲赵君陶生活。1938年，年方11岁的李鹏离开母亲，到成都去上学，寄居在姨妈赵世兰家里。1939年，邓颖超到成都指导妇女运动。邓颖超见到李鹏，征得他的同意，带他到重庆，后转送延安。此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李鹏都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关怀、帮助。这对李鹏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少年李鹏这样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关怀、帮助的孩子，为数较多，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儿子钱江、钱一平等；也有的是派往外地去工作的干部子女。周恩来、邓颖超视其不同情况，有的送往保育院，有的送到学校，每逢节假日，还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共享天伦之乐，并趁此机会，了解他们的健康及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周恩来、邓颖超给予他们的关怀胜似亲生父母所能给予的。

这些孩子们和周恩来、邓颖超之间，不存在社会上常见的那种收养、过继或认亲的关系，从未办理过这方面的任何手续。他们一般称周恩来为周伯伯，而称邓颖超为邓妈妈。当然也有例外，孙炳文、任锐夫妇的女儿孙维世，李少石、廖梦醒夫妇的女儿李涓，叶挺将军的女儿扬眉，就曾蒙周恩来、邓颖超的口头许愿，做他们的干爸，干妈，后来就这样一直叫下来。这是因为她们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交往很深，她们又都非常聪明、活泼，格外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喜爱。尤其是邓颖超更把她们视同己出。孙维世在“文革”期间被江青迫害致死，邓颖超伤心落泪，不相信孙维世会自杀身亡。邓颖超对何洛的遗腹子刘则仁的关怀，情况稍有不同。何洛是中共早期党员，曾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何洛的妻子因生活所迫，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一位上层军官结婚。早在1929年，邓颖超就托人带信给刘则仁的母亲，要她注意对儿子刘则仁的教育。1942年，邓颖超认刘则仁为干儿子，体现了党对这位烈士遗孤的关怀，并以这种方式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继承先辈未竟的事业。

周恩来、邓颖超喜爱小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们对于子嗣的作用却从来不予重视。周恩来的胞弟周同宇有6个子女。全国解放初，周同宇主动对兄嫂说：

“你们没有孩子，我的孩子多。你们挑吧，喜欢哪个，就给你们哪个。”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事。周恩来夫妇还是谢绝了。他们答复弟弟，将把侄子、侄女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而不给什么“名分”。事实也正是如此，全国解放后，周恩来、邓颖超把两人工资的三分之一都用来帮助亲戚朋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抚育侄儿晚辈们。

周恩来、邓颖超对于晚辈给予了无私的爱。1958年，孙维世对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说过：“周伯伯、邓妈妈对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女辈，在感情的天平上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更周到。在战争年代，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抗战胜利后，你们到上海找到了周伯伯和邓妈妈，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你们留在了当地。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俩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

周恩来、邓颖超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结成了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他们把相爱融化在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他们的爱情深长，永恒不变。他们的爱情高尚无私。

三

周恩来、邓颖超这对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他们以人们赞誉的“廉洁公仆”在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一座丰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群体的高贵品质。在我党领导全党坚决同腐败分子斗争，纯洁党组织的今天，他们是世人的楷模。

按照邓颖超的才能、资历和威望，她完全能够胜任更为重要的工作。可是在人事安排上，周恩来一向顾全大局，严于律己，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和享受的权利。邓颖超也完全能够理解周恩来所做的处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国解放后，妇女界的一些知名人士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曾有许多人提议邓颖超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没有被周恩来采纳；解放初期定干部工资级别，组织部提议蔡畅定3级，邓颖超定5级，邓颖超的级别已经够低，送到周恩来手上，他大笔一挥，5级就变成6级了；国庆十周年，主席团成员名单原有邓颖超，也被周恩来划掉了……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邓颖超是他的妻子。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导和批准建造楼房、桥梁道路，尽最大的努力把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他与邓颖超自西柏坡进北平城后，就

四、红色恋歌

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房屋幽暗潮湿，年久失修。1959年，趁周恩来出国访问的机会，有关部门对他们的住房和办公室做了必要的修缮。周恩来回京见状，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他对主管人员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了这件事，周恩来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反省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全部责任。

生活中，周恩来、邓颖超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即勤俭持家、节约为生活中的座右铭。他们的行为规范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周恩来认为“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早在大革命时期，新婚的周邓夫妇便开始了简朴的生活，他们将节省下来的钱支援革命运动。解放后生活好多了。但他们依然如故，没有专门的餐室，用餐常在办公室内，餐桌就是会议桌的另一头。他俩规定，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每餐两菜一汤。至于服饰更是简单得很，补丁叠补丁的衣服，织补又织补的袜子，修了又修的皮鞋。周恩来常常感慨地说：这比人民群众好多了，比过去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啊。简单和朴素形成了周恩来一家的风格。

周恩来节省下来的钱，较多的用在四个方面：抚养、培育烈士后代；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资助亲属；支付来开会的同志的（包括外地来的）就餐费、上缴党费。周恩来的家庭已完全同党的事业、同国家、同社会融为一体，是一个伟大的忘我无私的革命大家庭。

周恩来、邓颖超对后辈的爱是严正的，按照党内生活准则给以督促和鼓励，这就是他们给以自己所爱的人的特别关照。侄女秉建下乡到内蒙古草原，他们非常高兴。两年后，当秉建穿着军装来看望他们时，却不高兴了：周恩来夫妇要她脱下军装，回到草原。侄儿周尔辉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照顾夫妻分居，尔辉所在单位调其妻入北京。周恩来得知后，要求他们调回淮安，并告诉他们：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面，要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周尔辉夫妇愉快地回到淮安。

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绝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为了教育好后代，周恩来、邓颖超对看望他们的侄儿、侄女及其他亲属，专门制定“十条家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要求，不准

打着周恩来的招牌外出做事。这充分表现了周恩来、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深层次的关爱。

周恩来、邓颖超之所以能把革命与爱情完美地统一起来，是因为他们胸中始终装着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人类的进步事业，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革命，而坚持革命又是他们的共识，是他们爱情的基石。他们的爱融化在人民中间。同样，他们深得人民的爱戴。

天津有一座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为一对夫妇合建一座纪念馆，在党内是第一次，社会上也不多见。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古今伉俪谁堪比”，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树立了模范形象，也给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树立了模范形象。

（孟宪龄、谢燕）

患难与共 比翼齐飞

——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爱情之旅

1949年12月下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身在北京的一位中年女性收到了寄自遥远的莫斯科的一封家书。家书开头称：“亲爱的英和远志并告远征及远远。”

家书写道：

……近来还是感觉寂寞，不过比初期要好一些，刘佳武、朱子奇每隔一天来看一次（医生嘱不要每天都来，以免会客太多，妨碍静养），此外还有朱仲丽、曾涌泉、边章五等同志来看。今天师哲等约好来看。任岳通过两次电话，因近日外面有流行感冒，不许任何人会客，故她还未能立即见面。要待流行病减退后才能来……

已经交涉好在1月1日由一个女教员送远芳来莫斯科，她们将住在红十字会中央机关（因她们的国际儿童院就是该会中央办的，也亦是以前的互济总会）或另旅馆，则尚未定。

天气已冷，这里不大见太阳。北京想必很冷。这里约在零下四五摄氏度，室内温度则在二十摄氏度左右，故我在室内白天只穿两件单衣，晚间只盖一毛毯即够。这些穿的盖的吃的用的都由医院供给，自己不仅不用什么钱，而且几乎可以不用自己一点东西。

望你们都要好好注意身体。祝

你们都好。

家书末尾署名“你们的南”。

这是一封极普通特别的家书。说它普通，因为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和孩子们平平常常的信；说它特别，是因为此信出自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初成员任弼时之手。

这封信是任弼时入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不足一个月时写的。任弼时号“二南”。“南”是任弼时夫妇间的昵称，受信者是他的夫人、老红军战士陈琮英和他们

的孩子们（远志是大女儿，远征是二女儿，远远是小儿子）。

今天，细细品味这封家书，人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这一对革命伴侣爱情的美好与甜蜜。

他们的婚姻始终渗透了长辈的情感因素。任弼时一出生， 就决定了他的妻子将是陈氏的堂侄女——陈琮英

严格地说，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始于极具封建色彩的父母之命，是长辈之间的情感因素所致。1897年，任弼时父亲任振声的第一妻子陈氏不幸病故。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一儿半女，但两人感情很好，使时年27岁的任振声万分悲痛。于是，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任、陈再续姻亲。这样，七年以后任弼时一出生，就决定了长大后他的妻子将是陈氏的堂侄女——陈琮英。

陈琮英生于1902年，不足两岁母亲病故，父亲常年在外教书，她便随兄嫂生活。因为和任弼时的这种指腹为婚的特殊关系，琮英儿时常住弼时家中——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遗憾的是，琮英没有机会读书，本来就是靠兄嫂拉扯，生活已不富裕，哪里还有钱读书？更何况她又是女孩子！这时，弼时家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任振声不但要养家，还要供弼时读书。

12岁那一年，琮英到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了一名织袜童工。不久，弼时也到了长沙，考入一师附小，后又在明德中学、长郡中学读书。琮英虽收入微薄，但大哥达泉当时还在铁路上工作，家中无需琮英补贴，于是她就常常接济弼时一点零花钱。到底是从小一起玩大的，他们之间较少忸怩，只是弼时学业上越是不断进取，越觉得琮英应该读书。然而，现实是严酷的，琮英读书的事只得搁置下来。为此，弼时一直耿耿于怀。

1920年夏，弼时与琮英第一次分别的时刻到了，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这一年琮英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临行前，她将亲手织的两双袜子送给了弼时。

此一别就是6个寒暑。

1924年8月，弼时结束了莫斯科3年的读书生活回到了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看看一别四载的琮英啊！但是他刚一回国就被派到上海大学教俄语，紧接着担任了青年团江浙皖区区委委员，并与张伯简、俞秀松、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一起被聘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的编辑委员会的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随即参与了青年团中

央的工作，筹备团的“三大”。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局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5月初，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领导共青团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

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组织批准弼时回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

这天，弼时轻轻松松地买了江轮票，准备溯江而上。不料人与行李上船，忽然有同志急告：马上赴北京开会！弼时又立即下船，转而北上。

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意外地，琮英已先他而至，是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的。

4月，仲春时节，上海简陋的亭子间里，没有任何繁缛的仪式，没有灯红酒绿的欢宴，弼时和琮英结为夫妇。

新婚之际，陈琮英把自己，也是众多亲朋好友的担忧与不解坦率地向弼时提出。她不明白，任弼时作为追求新思潮、留学苏俄的“洋学生”，怎么会遵从父母之命坚持和陈琮英的婚约，而不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弼时回答：我们不正是在创造新生活？

从此，任弼时艰苦的革命生涯中有了忠实的生活伴侣。琮英则告别了长沙的织袜作坊，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者奔波无定所的生活道路，始料不及却义无反顾。

这一年任弼时22岁，陈琮英24岁。

白色恐小布磊尘上。任弼时一年之内两次被捕， 他和琮英永远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陈琮英走出长沙简陋拙朴的织袜作坊，置身于东方大都会的租界地。繁华闹市特有的喧嚣与冷淡，市井人际的计较与疏离……开始令她感到困惑和局促。弼时非常理解琮英的心理，除了鼓励她不要畏惧，学会适应外，还训练她开始做秘密交通工作，使她的生活有了新内容。闲时，弼时也带琮英逛逛街市，熟悉环境。渐渐的，琮英感到比较自如了。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弼时领导的团中央在青年工人与学生中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工作紧张繁忙。有时深夜才赶回家，第二天清晨又匆忙出行。琮英不管他何时回家，都要静静的等候，这使弼时感到特别温暖。也就是从这时起，弼时开始实现为琮英的“终身之谋”——教她学文化，并且是他亲自“执教”。

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会机，就会抱她、亲她、逗她玩儿，硬硬的胡楂扎得女儿不是躲就是哭，弼

时又马上把她逗笑。看着女儿挂着泪珠的笑容，弼时忍不住又要去亲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开心的。多么怡然的天伦情啊！

然而，接踵而至的不幸，将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这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新的中央回国开始工作。留守中央工作的弼时就在这时为传达六大精神和处理芜湖市委反对临时省委风潮，奉命去安徽巡视，就在这时不幸被捕。

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的还须是陈琮英。按照营救部署，要求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从上海赶往长沙。哪知到了上海站才知道当日车票已售完。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只得爬上了一辆拉煤的大货车。

秋夜的寒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车厢中的琮英和女儿，手脚被冻僵了，剧烈的摇晃还不时地将小煤块甩向她们。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寒风的袭击而引发肺炎夭折。

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离开了他们。

获救不到一年，弼时再遭逮捕。

1929年11月7日一大早，雨夹雪笼罩着大地，天空昏暗阴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准备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像平时一样，他行前告诉琮英：“我12点钟左右回来吃午饭。”说罢，匆匆出门。

12点了，弼时未归，午后1点了，弼时仍未归。3点、4点……琮英望眼欲穿地等到次日清晨，仍未见丈夫的人影。地下工作的经验与直觉告诉她：肯定出事了！她顾不得吃早饭，急匆匆赶到党中央机关。果然，李维汉操着一口浓重的湘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弼时被捕了，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弼时这次被捕是因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敌人“抄靶子”，搜去了他携带的一个地址，敌人就此设伏，被弼时撞上。弼时先被押在捕房。受审时，他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老羞成怒，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数日后，任弼时被巡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任弼时被捕后，周恩来亲自布置特科全力营救。一个多月后，弼时获释。

琮英终于把丈夫盼回了家，她抚摸着丈夫后背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泪水。这时，弼时反倒安慰妻子：“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

琮英第4次怀孕了。弼时说：“孩子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

1930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弼时去武汉，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5月，弼时偕琮英同往。

轮船载着他们溯江而上。弼时身着一袭山式夹袍，伫立中板，任江风吹拂满头乌发。他深知此行迎接他的将是和上海一样的白色恐怖。大革命失败后，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近期由于蒋、冯、阎军阀战争即将爆发，为巩固后方，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加紧搜捕共产党及红军分子，特务遍布码头、车站。

汉口到了，弼时挽着琮英，提着小皮箱从容不迫地登上码头，前来接应的同志把他们带到贺诚夫妇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局办事处联络站——华中大药房。

正式接上关系，弼时便在汉口租界闹市区租赁了一处门面房住下。

以什么职业为掩护呢？弼时早已谋划好了：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充当职业画匠。他和琮英把临街的房间布置成画室模样，墙上挂着淡墨山水画，案头铺开一张未完成的肖像画。乍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只是没有挂牌。

每天，琮英负责打扫画室，弼时照例外出或在家起草文件等。这样，一直到年底长江局撤销。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弼时夫妇俩就这样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斗争。

这时，陈琮英又怀孕了。夫妇俩偕行返回上海。

1931年1月7日，任弼时出席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数日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

那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交通线，很绕路。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

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娇小瘦弱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样子，弼时很心疼。这已是琮英第四次怀孕了，前面三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12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琮英在宝隆医院生下女儿远志。出院后不久，组织上安排琮英带着女儿住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家。

陈琮英怀抱女儿和向忠发的小老婆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

地下工作的纪律很严，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声称待一会就走。到了深夜12点，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了。

向忠发叛变了。

由于向忠发的出卖，敌人随即抓走了陈琮英和出生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村妇女，一问三不知。后来，敌人把她关进龙华监狱。不论敌人如何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女儿一哭一闹，敌人就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

半年多的铁窗岁月，琮英沉着，坚贞。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营救。最终，在周恩来布置有关部门全力营救下，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党中央随即安排她去了苏区。

琮英随弼时突围西征，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老乡家里。

弼时率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琮英把女儿送回汨罗，又只身返回延安

1932年3月8日，是弼时夫妇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福建长汀，他们重逢了。

弼时是很喜欢孩子的，但这次，琮英是只身来到苏区，没有把女儿带给丈夫。刚接到要她去苏区的指示时，她高兴地抱着女儿亲，想到很快就可以到苏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和丈夫、女儿共同生活，她开心地看着女儿笑。然而，冷静下来，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回湖南老家。去苏区，且不说路途上的险阻，就是安定下来，那么艰苦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带着1岁的孩子，怎么可能？

几番思想斗争，琮英抱着女儿毅然从上海回到汨罗老家，把女儿托付给婆母抚育。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第二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训令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沟通联系，想以此同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共同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南国暑热蒸腾之际，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她不得不把

儿子留在老家抚养。

两年前，她和女儿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家乡啊！可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啊！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那是可想而知的残酷。事实正是如此，从此，弼时夫妇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无。他们是被反动派杀害了？还是患疾病死去了？还是由于世事变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早已淹没于百姓中间了？谁能回答得了啊！

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此次征战，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

西征一开始，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琮英步子越来越慢，终于，她掉队了。幸亏，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他连背带拖地带琮英赶上了军团部的行列。弼时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码啊！”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

这一段时间，弼时夫妇俩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举世闻名的草地，这对他们夫妇来说，遇到的艰难比别人更多。因为当时琮英刚刚生了二女儿远征。前面几个孩子不是夭亡就是寄养他处，唯有这个女儿真真实实地在眼前。弼时为了照顾好妻子和孩子，行军中他缝了一条布袋，坚持把女儿背上，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前行走。宿营时，弼时就给琮英钓鱼。就这样，夫妇俩相扶相携，并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胜利地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任弼时夫妇再度暂别：身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率部开赴山西抗战前线，陈琮英再度回老家汨罗，把长征路上生下的女儿远征送回去，自己又返回延安。

1938年春，任弼时奉中央指派赴苏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此番远行弼时偕妻子同往。

10几年生活在弼时的身边，10几年革命工作的锻炼，琮英这位昔日的湖南妹子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紧张、繁

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 1938 年 12 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

从夫妻生活上说，这是他俩自结合以来最轻松愉快的日子。步出战争的硝烟，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和平环境中，尽管工作依然繁重，但精神上是难得的放松。工作之余，弼时时常哄小女儿欢笑，颇爱摄影的他更是常找机会把 3 口之家的欢乐印在相纸上，留在记忆里。

1940 年 2 月 25 日，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一次面临与女儿的离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女儿留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弼时检查身体， 诊断他患脑血管硬化，而且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 年 3 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任弼时夫妇再度分别：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这次分别时，琮英很为弼时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弼时检查身体，确诊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1947 年 11 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组织上捎信，让她到陕西米脂县钱家河去一趟。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从山西兴县匆匆赶来。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和工作，弼时的血压又升高了，头晕目眩，他病倒了。中央安排他到钱家河静养。

这次发病，是弼时健康的一个大滑坡。这时，在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中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的“左”倾错误，引起弼时密切关注。在钱家河不足 20 天里，他对附近村落土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汇总分析了周边 30 多个村落的基本情况。不久，他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又赶回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在准备会议中，弼时负责主持土地改革小组的讨论。会后，奉中央的命令，他利用 1948 年元旦假日，集中精力撰写《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在 1 月 12 日召开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讲演。

静养，变成弼时又一个紧张的工作高峰。单从他作报告的样子，谁也不会感到